

·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时盖平县的地方情况

叶剑忠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时，我任盖平县职业学校校长。

1931年9月19日上午，盖平县县长辛广瑞用电话紧急召集全县机关首领会议。我放下电话便急趋赴会。甫入会场，见室内满满地挤了一层的人，会场气氛非常紧张，与会之人都是面色苍白，眼含酸泪，我很以为怪。站在我身旁的电话局长李甲三沉痛地低声告诉我：县方倾接日本关东军的警告，说今天午后2点，日本军队进攻盖平县城，实行占领。我听完这话，觉得一阵脑晕，全身发抖。认为亡国之惨祸，就在目前。这时，辛广瑞大发其词，他说南京政府的国策是欲攘外必先安内。现在是集中兵力讨伐华北叛军石友三，对于日本侵略东北，采取不抵抗主义，将靠国联代为解决。省政府早有明令，本县长奉命惟谨，坐守此邦，事事要听中央命令。尔等要深识大体，服从国令，都应一律服从日军接收，不得任意抗衡。在军警方面只许缴械改编和遣散。这完全是执行投降政策。于是开门揖盗，设酒迎凶，大摆欢迎宴。从此日起，全县人民就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。

教育局长杨庆春，也更是小心翼翼地、惟慕惟谨地发表了一道严格的命令。他命令各中学校要切实管束学生，如有学生挑衅惹祸，拿该校校长是问。

散会之后，我和李景章、沈襄卿等几位中学校长互相商议了一下，就各自回校。回校后，我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校务会

议，传达了县长、局长的口头命令，并安慰了全校教师，要平心静气地服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。然后，我就信步出校，想听听外面的情况，刚一进城，就看到各商号都上严了门板，再回头一看，西城墙上站了不少黄色的日本兵，正在鸣枪示威。县署门前，一群更为凶恶的日本兵也把机关枪架好。这时，县长、公安局长命令全城军警，谨慎小心地听候日军的接收、查点。

这时，我心似怀鹿七上八下，赶回校中，还得故作镇静，不能声张。教室里一团死气，老师和学生沉默不语。我回到办公室后，又接到县方的电话，内容是让学校挂牌放假。于是，训育课集合点名，会计课算帐找费，里里外外忙做一团。天黑以后，县方催逼更紧，限令各学校学生连夜出校，不准在城内逗留。这一夜，谁也没睡觉，天将破晓，学生都离校回乡了。安东（今丹东）籍的王开山老师也登车回去了，其余的本县老师也都整装返里。只剩下我和几位校役负留守看校之责。

9月21日，市面的情况又有了变化，落款“本庄繁”的关东军的布告贴满了四门，内容大意是把东北军阀的“残暴”臭骂一顿，把“皇军”的“敬老济民”大肆恭维一番。当时街上冷冷清清，很难见到一个行人。我在街上也不敢久留，回校后，藉酒消愁，一醉了之。约10时许，校役张维民从街上归来，满头大汗、惊慌失措地说：日本兵带来不少日本侨民前来查校，怎么办？我藉酒壮胆，说，这有何妨？就迎上前去。果然见日本兵手提刺枪，怒目而来，向我说三民主义拿来。这一句我还听得很清，我说三民主义烧了。他们就拉我上教室去翻，我说教室门封死了。他就逼张维民打破一个窗户钻了进去，结果没有找到三民主义。临走时还骂了一顿混蛋……

象这样亡国痛心的遭遇，我一生也不能忘掉。

当时的盖平县公安局长是位姓胡的（名字忘记）的开原人，

他在县长辛广瑞的监督下，把一座文化古老、经济繁荣的县城和地方优秀武装拱手交给了敌人。

我还记得在盖平西关中学的小东山上驻有一小队炮兵，拥有山炮两门，为守城之用。在栾队长的率领指挥下，偷偷地把炮运走了。

10月10日，我擅离学校，私自回家。我家住在县城西南的腰屯村，当夜，日军炮兵乘满火车在我村西北方停车一小时，向龙门汤发炮10余发。一声声巨响声震天地。时正夜间9时，村人已就寝。炮声惊起，四处逃避。我与家人同避于床下。翌日讯之，炮弹皆落人龙门汤温泉中。日军这次炮击的目标是地方称之为便衣队的一支抗日武装。便衣队的头领一是丁家生（二道河里沟雪帽山），一是野狼（绰号）。共带兵200余人，占据了龙门汤南山为根据地，经常向各处日军袭击。经过这次日军炮击之后，觉得难以在根据地站稳，就连夜撤军了。后来，在日伪两军夹攻之下，丁永生在熊岳东山三岔被牛德坤所包围，从容就义。临死前浩气冲天，大呼中国不亡。实可称为爱国烈士。

伪满盖平县警察所长高学本，为日本人卖命，杀死不少便衣队员，牛德坤也是屠杀义勇军的刽子手，后来皆被镇压。满天血债，一笔还清。

10月20日左右，我返回了盖县，辛广瑞在老商务会礼堂召集大会。大发牢骚地说，事变以来，以将及日，县城各机关胆小的都避难去了，胆大的在城内不是抢官就是夺印。辛为什么发这牢骚？是话中有话。原来盖平县有个在旧社会宦海失意的坏家伙，说他是地痞也好，是土豪劣绅也行。此人名叫刘冠三，曾在哈尔滨特区警察管理处，当过金荣柱的入幕之宾，为争权夺利，曾和金荣柱大起冲突，互相倾轧，成为当时社会宦海中的两个政敌。事变初，刘冠三在家赋闲，想借日本人势力，混

上一个伪满开国勋臣，作一番卖国功业。后来事败而死，侥幸没当上伪国汉奸。至于金荣柱，得天独厚，一帆风顺，不几年就扶摇直上，官至奉天省长，“荣升”为伪满一流大汉奸。

事变当时，刘冠三认为日本人占领东北是他当官的好机会，就弹冠相庆，想东山再起，尝一尝满洲国盖平县地方官的滋味，并把将来的“刘家天下”的全部新贵名录，做了一番安排。偏在这时，在盖平发生了一起“大案”；10月初，一位卖咖啡的日本浪人（名为山口）被杀，凶手在逃，一时难以结案。日军刚一进城就有日本人被杀，实可为“大案”了。辛广瑞当然是责无旁贷了。刘冠三在这时，便下井投石，说山口之死与辛广瑞有关。于是，大石桥守备队和警察所就责成辛限期破案，捉回凶手，否则，就让辛广瑞偿命，移出来的县长位置给刘冠三作为酬劳。辛广瑞也确实知道他是被刘冠三陷害和中伤。当即下令捉拿刘冠三。刘闻声投到日警派出所恳求保护。事关生死，辛广瑞要求行赦，日警无法再做保护，不得不放出刘冠三，于是，刘为辛所擒获大堆子路西某商店后院。几经拷问，刘供出真情，山口案也真相大白。辛广瑞将刘冠三处死之后，保住了县长的官椅。

事后，辛广瑞在曾大发牢骚的地方——商务会礼堂大摆宴席，日方的大石桥守备队长和警宪长官等和全城上绅百余人出席，百余名妓女也落坐席间，灯红酒绿，热闹非凡，酒菜面前，那些中国人已经不知“国”为何物了。辛的这一活动无非是为了取日本人欢心，保自己的官位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初，我抱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想法，认为天下大乱，就在眼前，自以为大乱住乡、小乱住城。我还是回乡安排山中生活要紧。至于留守看校的事，推在几个校役身上，说给他们多准备点大米、白面就可以了。

另外，事变时日本人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是十分注意的，10月下旬，日本兵到西关中学去检查，用刺刀挑开了张学赢老师的箱子，取出一本笔记，认为有反日嫌疑，当即逮捕，受尽酷刑，这一事实使教育界的人士受到很大威胁。

关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时盖平县的地方情况，我所知道的今作以上记述，还请知情者加以补充。

（摘自《营口文史资料》）

郑家屯沦陷一瞥

崔翠华回忆 刘长顺整理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炮击沈阳北大营，占领了当时的东北首府沈阳，继而东北沦陷。

当时我在郑家屯的辽宁省立第四高级中学读书。事变消息传来，震动了郑家屯的人民，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，当晚大家聚集在学校，情绪激昂，慷慨陈词，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，深憾东北军不予抵抗。

这天夜里，驻守在郑家屯城内的东北军裴团部队奉命激退，也有些仁人志士不愿作亡国奴，悄悄整理行装，准备奔赴关内。辽源县庆余银号为不使货币资敌，在军警严密警戒下，把一堆堆纸币点燃焚毁，浓烟滚滚，火光照亮银号一条街。我从学校很晚回来，目睹这一切，感到怅然若失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怀着十分沉痛苦闷的心情来到学校，见同学们在操场上、走廊里，三五成群，谈论着自己的见闻，一扫过去那种井然而欢快的气氛。